

第一部分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过程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大传统、一大优势，伴随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走过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过程。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史，也是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创立、大发展、继承创新、曲折和新的探索这样五个历史时期。

第一节 创立时期

(1917 年—1937 年)

在党的创立、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制度和理论基础基本确立。从一定意义上讲，党是靠思想政治工作起家的。

一、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端。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最早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社会的新的出路和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先后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李达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接触工人群众，使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地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开始指导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恐慌，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也出面充当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于是出现了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大论战。经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等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一步一步地扩大自己的阵地。通过这些斗争，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重要的宣传工作经验。

二、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规定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并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思想宣传机构——中央局宣传部，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建立。接着，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也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主要活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

《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推动建党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为此，“必须把工农劳动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这就实际地确定了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工农群众，宣传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一大”组成中央局，下设宣传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为主任，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思想宣传机构。1924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设立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日常宣传工作。

三、1924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工农运动，并在国民革命军中开展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在北伐战争中初显威力。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大多数干部、党员加入了国民党。经过他们同进步的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在农民群众中开展思想工作。1925年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韶山一带开办农民夜校，利用学习文化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年10月，毛泽东又从湖南到广州，不久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他利用这一条件，创办《政治周报》，在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他还主持了第六

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农民讲政治理论。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1927年初，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于同年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贯穿于文章中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基础之一。

与此同时，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也开展了政治工作。黄埔军校与一切旧式军校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1924年11月，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对建立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6月，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上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工作的报告》，对于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意义、内容、方法等问题都作了简要说明。北伐军中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由于有党领导的政治工作，因而在北伐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成为威震敌胆的“铁军”。

四、1927年三湾改编，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政治机关制度。随后又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斗争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和军队的建设。1927年9月，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军队

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强调必须在党内和军内进行政治教育，努力提高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使之掌握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武装工农等各项知识，自觉地为工农阶级作战。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由于执行这三项任务，部队不仅能够打胜仗，而且广泛发动了群众，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1928年春，毛泽东又总结几个月来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发展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作用。

五、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个决议解决了如何从加入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之后，中央为落实古田会议决议精

神，又制定系列具体条例。

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认识，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它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阐明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方针原则等，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了把古田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到各个部队，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1年2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毛泽东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陆续制定了《政治委员工作须知》、《连指导员工作须知》、《红军士兵会章程》等系列文件，使红军的政治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六、1934年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

1934年2月，为了总结几年来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时刻，中央军委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首次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为了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周恩来还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业务工作相结合，政治工作要渗透到军事工作、业务工作中去的重要原则。他强调：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着前线的胜利，部队政治工作的实施，要环绕在整个作战计划的周围，根据战斗任务的变化，政治工作必须机动、灵活、紧张和迅速。政治工作人员同样是红

色军人，必须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和战术，要会指挥打仗。

可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被排斥，使党和红军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治工作遭受挫折。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红军终于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胜利到达陕北。

七、1936年底到1937年夏，毛泽东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论著，系统地论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当抗日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36年底到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论著，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清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回答党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

验的总结。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书中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标准。

《矛盾论》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它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著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创立时期提出的口号有“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

第二节 大发展时期

〔1937年—1949年〕

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理论体系更加丰富，方式方法更加多样，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大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一、抗战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发表许多有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围绕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目标。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概括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在《论持久战》中，他精辟地论述了战争与政治、人与武器的关系，提出“民兵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不是物，因而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就要发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来支持战争。

1938年1月，周恩来写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明确提出了“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重要论断，透彻地阐述了军事与政治、加强政治工

作与改进政治工作、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证关系。

刘少奇抓住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两个基本问题，用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开办党校，亲自讲课，为党和军队培养干部。1939年7月，刘少奇应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邀请，为该院学员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演讲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意义、内容标准、目的要求和方法途径等，大大地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很快就成为全体党员，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学习的教材。

此外，其他很多党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也作了不少有关政治工作的报告，写了不少有关政治工作的理论文章。如罗瑞卿著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张际春的《抗大政治工作及其经验》、傅钟的《八路军抗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等。我军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重视政治工作经验总结与政治工作研究的气氛明显增强。

二、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确立，为系统总结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经验提供了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到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为代表的一批重要理论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

形成。这些著作使党和人民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确立，为我们党系统总结宣传思想工作经验提供了根本前提。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对建党以来的宣传思想工作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这个提纲共12条，主要内容有：一是规定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强调要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党的纲领主张和战略策略，在思想上动员人民为民主革命彻底胜利而奋斗；二是阐明了宣传鼓动工作的特点、原则和方法，强调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进行宣传教育；三是论述了党内教育工作、群众鼓动工作、文化运动和新闻出版工作的关系，强调要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四是阐述了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强调这两项工作是我党工作的两大政治工作部门，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五是阐述了宣传干部的培养和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强调要逐步形成一个思想宣传组织系统。宣传工作的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已达到全面成熟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标志之一。

三、1942年春天开始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在党内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的党风有些不正，就是有

宗派主义的毛病；我们的文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不正的作风，在遵义会议以后，虽然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它们还在经常作怪，并导致党内在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一种错误如果没有被真正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另外的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出现。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这种需要，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统一，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需要进行这样一次全党的整风。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全党的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全党整风的条件就渐次成熟了。

整风学习在全体干部中进行，是从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两篇讲演开始

的。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学习共分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五个阶段。

全党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党内的主观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这样，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不团结等“闹独立性”的问题，要求全党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的表现形态。不消除党八股，不能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不能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主观主义就还有藏身之地。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两条宗旨，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相反的。“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就是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不是为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为了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

效的。

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30年代前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的阵地。整风运动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1944年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我军政治工作史上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进一步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方针原则。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人们越来越感到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迫切要求党中央能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党在军队的政治工作加以科学总结，以指导我军的政治教育工作。1944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由当时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具体组织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阐明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性质、方针、原则、方法和制度。报告总结的基本

经验主要有：第一，必须正确估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第二，必须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三，必须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如民主平等、说服教育的方法，依靠积极分子与照顾多数相结合的方法，领导带头、率先垂范的方法，典型教育与典型批评的方法。报告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中的不良影响，发扬了我党政治工作的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推动了全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发展。

五、1945 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七大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充实和完善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思想首次被写入党章，被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在 1945 年 4 月至 6 月举行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件事，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最早见于王稼祥于 1943 年 7 月 8 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该文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在 1943 年至 1945 年间，刘少奇、王稼祥、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许多领导人都曾论述过毛泽东思想，而以“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加以系统阐述的，就是王稼祥的文章和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

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更为系统、深刻，更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还规定在党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这就使全党能够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得到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强有力的保证。

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还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三大作风的提出，充实和完善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和方法。

六、解放战争时期，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教育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创造了一系列群众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好方式。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极力调兵遣将，抢夺抗战果实。与此同时，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对美蒋存在着和平幻想。针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表系列讲话，阐明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面